

《特鲁瓦条约》后法国“二元君主制”的建构

王玉亮, 郝文卓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天津 300387)

摘要: 百年战争后期, 英法围绕法国王位继承权与王权合法性展开激烈博弈。英方凭借《特鲁瓦条约》确立对法国的摄政权与继承顺位, 并通过舆论宣传、象征符号等手段, 塑造英王“双王”的合法性。法方则借助兰斯加冕的传统与圣女贞德的形象塑造等予以反击。同时, 法国地方贵族势力根据自身利益不断调整政治立场, 直接影响到英法双方胜败局势走向。在这场关于法国王位继承权与合法性的斗争中, 英法两国王权的正当性不再仅依靠血统与法律宣称, 而是在战争与社会动员中被不断重构。同时, 也间接造成了近代早期以来两国不同的政治建构趋势。

关键词: 《特鲁瓦条约》; 二元君主制; 王权合法性; 圣女贞德

中图分类号: K56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2-0098-09

收稿日期: 2026-0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LSYZD21020): 中古中国与欧洲文明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王玉亮 (1973-), 男, 河北廊坊人,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郝文卓 (2002-), 男, 河北唐山人,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2.006

英法百年战争 (1337—1453) 不仅是一场持续百余年的军事冲突, 更是一场围绕着法国王位继承权和王权合法性的政治斗争。1415 年法国军队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惨败, 1420 年法王查理六世被迫与英王亨利五世 (Henry V) 签署了《特鲁瓦条约》(Traité de Troyes)^①, 后者凭借该条约获得了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致使法国形成了事实上的“二元君主”^②的特殊格局。该条约动摇了法国王位继承权传统, 引发了王位归属、王权合法性等一系列危机。后来随着布列塔尼公国、勃艮第公国等地方势力政治立场的转向,^③英王亨利六世在法国的王权统治开始动摇, 且几代英王长期经营的法国领土也逐渐丧失; 战争失败和失去在法国的领地, 又引发了英国国内的贵族不满。与此同时, 勃艮第公国将其政治与经济重心转向低地国家, 客观上减少了其在法国本土的影响, 这也有利于法国君主制向集权化迈进。

对于英王在英法两国身兼双重君主身份的“二元君主制”, 西方学界的初步探讨始于 20 世纪后半叶。最初多立足于军事史与王权扩张视角, 认为《特鲁瓦条约》是英方凭借战场优势对法国王权的暂时接管, 其统治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缺乏实质认可。^④或认为“二元君主制”仅是一种借助政治宣传建构王权合法性的策略。^⑤也有学者从法国内部的贵族派系斗争视角研究英王亨利五世的法国王位合法性。^⑥进入 21 世纪后,

①《特鲁瓦条约》规定, 在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死后, 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及其继承人将继承法国王位。该条约于 1420 年 5 月 21 日在法国城市特鲁瓦正式签署。

②“二元君主制”: 指两个独立的王国由同一位君主统治, 奉行相同的外交政策, 彼此组成关税同盟, 拥有联合军队, 但在其他方面实行自治。这里指的是 1420 年《特鲁瓦条约》签署之后, 英国国王亨利五世被确立为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合法继承人, 并在 1422 年英法两位国王先后去世后, 其子亨利六世在形式上继承英法两国王位。

③1435 年勃艮第公爵在阿拉斯条约中突然改变立场, 导致其与英国的同盟破裂。

④Christopher Allm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 1300-c. 1450,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⑤Ralph A. 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The Exercise of Royal Authority, 1422-146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222.

⑥Mark Warner, “The Anglo-French Dual Monarchy and the House of Burgundy, 1420-1435: The Survival of an Alliance”, *French History*, Vol. 11, No. 2, June 1997.

随着政治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不断发展,学者更加关注合法性话语的象征建构。麦肯纳(McKenna)关注亨利六世及其政府如何借助硬币、徽章、仪式和史书等象征手段强化其“双王”身份。^①与此同时,蒙罗(Munro)从经济史视角分析英国与勃艮第联盟的瓦解,指出地方精英更关注自身利益而非依据国家认同行事,^②反映出早期民族与国家观念尚未成熟。

国内对于“英法二元君主制”的直接研究较少。朱明通过剖析瓦卢瓦王朝如何利用巴黎城市空间和物质文化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拓展了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视野。^③杨松则聚焦勃艮第公国,指出其在百年战争后期的立场转变,不仅影响了战争,还促进了法国民族国家的演进,以及英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④这些研究仅仅从侧面涉及“二元君主制”问题。

法国王位继承权问题,直接影响到近代早期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英王在法国“二元君主制”的合法性构建、法国贵族势力的政治认同对“二元君主制”合法性的影响,以及查理七世重建王权正统性等三个维度,结合百年战争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揭示15世纪晚期法国国家秩序重构的复杂性,还有助于认识到法国民族国家形成前夕中央与地方权力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英王在法国“二元君主制”的构建(1415—1430)

1328年法国国王查理四世死后,加佩王朝断绝男性继承人。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以其母亲伊莎贝拉为腓力四世(Philippe IV, 1268-1314)之女,自己为查理四世的外甥,具有法国王室血统为由,主张其拥有对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权。但瓦卢瓦伯爵腓力六世(Philippe VI)凭借《萨利克法典》中关于女性不得继承王位的原则,排除了英王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爱德华三世辩称:《萨利克法典》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的母亲虽然是女性,但拥有法国国王直系血统;自己的父亲又是英国合法君主,因而可以继承法国王位。双方在此问题上各执其词,结果是,自1337年起一场围绕法国王位继承权与王位合法性的百年战争爆发了,而爱德华三世甚至干脆于1340年自称“法兰西国王”。这就是法国“二元君主制”的由来。如果说,从14世纪前叶以后双方处于“二元君主制”的辩驳与战争阶段,那么自15世纪上半叶《特鲁瓦条约》签订后,则开启了“二元君主制”的落地实施。

(一)《特鲁瓦条约》对英王继承法国王权的合法性设计

英法百年战争断断续续,到查理五世统治末期,^⑤法国重新夺回了被英国占领的大部分土地,一度取得明显优势地位。然而,随着1392年查理六世(Charles VI)在远征布列塔尼公国途中突发精神错乱,加之国内两大贵族派系阿马尼亚克派与勃艮第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法国此前取得的优势荡然无存。1415年,随着法国军队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惨败,英国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的亨利五世进驻诺曼底地区,并不断扩张。战争的失败导致法国国内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勃艮第公爵无畏约翰(Jean sans Peur)的军队占领巴黎。查理六世试图与其和解,双方商议在蒙特罗桥(le pont de Montereau)上进行和谈。但无畏约翰却被查理的随从刺杀身亡,致使法国政治局势发生剧变。^⑥无论是基于仇恨还是基于对家族利益

①J. W. McKenna, “Henry VI of England and the Dual Monarchy: Aspects of Royal Political Propaganda, 1422-1432”,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28, no. 1 (1965), pp. 145-162.

②John H. Munro, “An Economic Aspec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Anglo-Burgundian Alliance, 1428-1442”, *Speculum*, vol. 63, no. 3 (1988), pp. 571-606.

③朱明:《中世纪晚期巴黎的王权与城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④杨松:《论勃艮第公国对百年战争后期阶段的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12期;杨松,《论勃艮第公国的兴衰与早期现代国家的源起》,《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

⑤学术界对于百年战争的阶段划分有不同的观点,这里采用三个阶段的划分方法:爱德华统治时期(1337—1360年)、查理统治时期(1369—1389年)以及兰开斯特时期(1415—1453年)。

⑥查理六世本意重获约翰的政治支持,但由王太子查理指使的这一刺杀事件却将勃艮第公国推向了立面,促成了约翰的儿子善良菲利普与英国之间的联盟。

的现实考量,这次刺杀事件都为英国与勃艮第公国的政治联合铺平了道路——亨利五世借助法国贵族并通过《特鲁瓦条约》实现了其个人政治野心。面对英国与勃艮第公国的政治联合,法王查理六世不得不与英王亨利五世、勃艮第继任公爵善良菲利普(Philippe le Bon)共同签订《特鲁瓦条约》。

该条约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一是英王亨利五世以摄政王身份管理法国直至法王查理六世去世,之后亨利五世继位为法国君主同时统治法国和英国。二是英王亨利五世迎娶查理六世之女即法国公主凯瑟琳,其子孙后代将永远统治法国与英国,即英国与法国联合成为共奉一王的国家。三是为避免凯瑟琳后代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受到法国女性继承原则的挑战,英王亨利五世“被”法国王室收为养子,从而自身及子嗣也就获得了法国王位继承权。按此条约,首先是废除了查理六世之子、凯瑟琳之弟王太子查理的王位继承权,确保亨利五世及其子嗣承继法国王位;其次是法国与英国联合成为共奉一王的国家,实际上是由英王男性血统继承。同时,为了保证条款的实行,巴黎法庭以“冒犯君主罪”、“叛国罪”剥夺王太子查理(即后来的查理七世)的继承权并没收其全部封地与头衔。^①从该条约规定和巴黎法庭的判决看,在查理六世死后,王太子查理被彻底排除在合法继承序列之外。

《特鲁瓦条约》为“二元君主制”提供了法理依据,英王亨利五世通过联姻和法律裁决等手段真正取得法国王位,从而使“二元君主制”从名义走向现实。由此,英法之间的军事对抗,从英王争夺法国王位继承权,变成了英王为维护自身法国王权合法性——法国王太子查理夺回王位继承权的战争。

尽管王太子查理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但他仍能凭借法国南方贵族的忠诚与民众的支持维持法国独立的王权结构。他控制着卢瓦尔河以南的布尔日(Bourges)地区,常被称为“布尔日王国”(Royaume de Bourges),因而查理也被称为布尔日国王,这一称呼虽然带有一定的贬低性,但也说明了法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北部巴黎与中部由勃艮第公爵掌控,西北部的诺曼底被英军控制,南部则由查理据守。

(二) 亨利五世对“二元君主制”的维护

亨利五世为维护其法国王位合法性,主要采取了三种主张或策略:如前所述,一是借助法律文件,如对《撒利克法典》的不同解读,以及《特鲁瓦条约》的签订,为其继承主张提供法理渊源和现实法律依据;二是与凯瑟琳的联姻,不仅确证对《撒利克法典》的解读(即法国国王之女的子嗣也拥有法国王位继承权),确保自己当时对法国的掌控,而且还为后继英王的法国王位继承权铺平了道路。

第三种策略,就是赢得法国“民声”。持久的战争状态迫使英法两国政府逐渐形成一种以公共舆论宣传与社会动员为核心的方式,赢得“民声”,才能获得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撑。早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为阐明其对法国王位的主张并争取本国民众支持,就已采取公共舆论广为宣传引导。到爱德华三世时,如1346年曾下令让多明我会修士在各种场合的布道中反复宣讲王室立场,既阐明开战缘由,也宣扬己方宽厚理性,以便与法王的伪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②同时,为了征兵、征税、征调各类物资,国王还颁布一系列诏书、法令,阐明夺取法国王位而战的理由,并要求民众为获得战争胜利“为国王祈祷”^③。这反映出,在百年战争中,英国已非常倚重舆论动员策略;王权已不再仅仅依赖贵族,开始转向普通大众。将舆论引导、宗教动员、财政征发与军事征募等方式结合起来,表明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发生了改变。这种“舆论政治”新策略既是对传统封建(封君与封臣)关系的突破,也体现出中世纪晚期君主政权向现代主权国家雏形的过渡。此后公众舆论不再是王权合法性的附属品,而成为国家整合社会、实现全面动员的关键因素。

亨利五世时,他不仅在英国本土继续进行此类舆论政治宣传,而且也将此做法推行到法国,只是时日未久。

^①参见[美]黛博拉·A.弗雷奥利:《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刘晶波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76-180页。

^②Rymer, Foedera, Vol. III, pt. 1, pp. 72-73.

^③W. R. Jones, “The English Church and Roy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War”,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9, No. 1 (Autumn 1979), p. 30.

（三）亨利六世时“二元君主制”的失败

1422年，查理六世和亨利五世接连去世，亨利五世与凯瑟琳之子——出生仅九个月便承袭“英国国王兼法国国王”之名，即亨利六世。因其幼小，由他的两位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good Duke Humphrey）在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约翰（John of Lancaster）与勃艮第派贵族在法国分别摄政治理。两位公爵认识到，要想维护两个王国的统治，首先必须保证英国本土的稳定，即继续实行亨利五世在位期间的舆论宣传政策，说服英国民众相信英王在法国的举措正当合理，并且保证军事行动不会损害本国独立地位，舆论宣传最直接的结果是激发英国民众对征税、征兵的响应。同时贝德福德及其在法国的同僚们致力于说服法国北部民众认可亨利六世对法国王位的合法主张，并揭露查理七世的卑劣行径。^①并在语言上加以引导控制，如在1423年的军纪条例中明令禁止称“敌人”为“法国人”，只称为“阿马尼亚克”；明令禁止称查理为“国王”，只能称其为王太子，意图通过禁令来削弱查理的合法性，否认其君权。^②

针对法国王太子查理于1429年7月于兰斯加冕，年仅八岁的亨利六世也于1429年11月6日，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举行加冕礼，并在加冕仪式上突显双王寓意。此次仪式不仅延续英国加冕传统，更有意融入法国加冕元素。宴会的金豹与百合纹章甜点与表演^③成为王权的有力象征：在宴会正式上菜之前，由杏仁膏、糖和面粉制作的点心（subtlety）被精心摆放在餐桌上，构成的场景装饰展现出亨利对英法两国的统治权；英王卫士菲利普·迪莫克爵士（Sir Philip Dymoke）身披全副铠甲、扮作圣乔治、骑马进入宴会大厅，向在场宾客公开宣称国王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④这场仪式以文字、图像、视觉与口号多重手段建构起亨利六世“英法双王”的合法性，固然增强了亨利“双王”的形象，但实际上更像是英国宫廷的自我表演。

但随着英国在法国投入的军事与政治资源日益加重，加之本土矛盾的持续激化，英国社会内部逐渐出现对法国领地价值的质疑。在此背景下，摄政政府开始进一步加强对“亨利六世双重王位正统性”的舆论引导，以回应社会对英法联合王权合理性的疑虑。在英国本土，由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委托利德盖特（Lydgate）翻译法文宣传诗，通过诗歌传唱，强调亨利六世的“合法继承”与“神圣血统”，进一步强化亨利六世继承的正当性及其头衔的合法性。在法国，贝德福德则通过不断发布战报（如圣女贞德已被处死等）向法国贵族、教会和城市机构宣传英军作战胜利的消息以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并以货币、挂画、祈祷书等象征性图像进一步强化亨利六世的双王合法性。^⑤通过这种宣传，以求稳固英国本土对“二元君主制”的支持，并在法国控制区营造查理“伪国王”的形象。在实行舆论宣传政策的同时，亨利六世还采用并改进了其父在法国占领区铸造的盎格鲁高卢银币（Anglo-Gallic coinage）：新型“blanc aux deux écus”，正面并列英法盾徽、铭刻“HERICUS”。^⑥意在以货币这一日常流通载体传播“王权合一”形象，提升民众对亨利六世双王统治的接受度。

1431年，亨利六世又来到法国，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仪式，想以此挽救战争败局和人心。然而，与查理七世按法国传统在兰斯大教堂进行的加冕礼相比，亨利六世的伦敦加冕礼虽充满政治含义，却缺乏在法国王权观念中最具权威的宗教传统——兰斯大教堂才是法国历代君主加冕之地，其神圣性远非威斯敏斯特所能替代。亨利六世在伦敦的加冕虽然声势浩大，却始终是英国环境下的仪式，并不能证明其法国王位

①J. W. McKenna, “Henry VI of England and the Dual Monarchy: Aspects of Royal Political Propaganda, 1422-1432”,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28 (1965), p. 151. 王太子查理在查理六世死后，自行宣称为查理七世。

②McKenna, *Henry VI of England and the Dual Monarchy*, pp. 151-152.

③亨利六世加冕宴会的菜肴均记载于伦敦中世纪编年史：Egerton MS 1995, ff. 176v-177r. 宴会记载显示，每道菜都带有独特的含义。这些含义和相应的诗句都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突显出亨利作为英法国王的双重身份以及两国的团结。

④British Library, “The Coronation Banquet of Henry VI”, Digitised Manuscripts, last modified May 18, 2023, <https://blogs.bl.uk/digitisedmanuscripts/2023/05/the-coronation-banquet-of-henry-vi.html> [2025. 7. 30].

⑤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The Exercise of Royal Authority*, 1422-1461, pp. 219-221.

⑥J. W. McKenna, “Henry VI of England and the Dual Monarchy: Aspects of Royal Political Propaganda, 1422-1432”,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28 (1965), p. 147.

的合法性。此外,从巴黎加冕礼的混乱也可见,亨利六世未能实现其所期待的效果。巴黎圣母院的圣职者与英国廷臣之间爆发激烈争执,晚宴期间更有大量巴黎市民强行闯入,加冕结束后亨利未能按惯例发放王室赏赐,引发民众不满,这种财政拮据与仪式不全,恰恰揭示了英王在法国的脆弱处境:试图借助仪式巩固合法性,却因资源和认同不足而适得其反。完成加冕后亨利即刻启程回英,此后再未踏足法国。^①因此,这场加冕仪式更像是一次象征性行为,其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法国民众并未普遍接受亨利的统治,英王未能在巴黎确立起其王权神圣性,反而造成英王在法国占领区的权威断裂。如果说1429年的伦敦加冕是亨利对“英法共主”愿望的公开宣告,那么1431年的巴黎加冕,则是这一愿望在现实条件下的最后尝试。

这种合法性的断裂不仅仅是法国民众不支持所导致的,还与英王的经济和军事的衰败息息相关。亨利五世给亨利六世留下的是负债累累且四面受敌的“双王”身份:在其统治初期英吉利海峡舰队已被废弃,“舰队总管”职能边缘化,致使海上补给线中断,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占领区因此无法获得来自英国的援助。再如,加来要塞年需军费近19,000英镑,然而本地税收仅有3,000英镑,^②虽然英王多次以赎金和羊毛税救急,但仍因军饷拖欠,致使加来驻军越洋回国请愿抗议,使得中央财政信誉几近崩溃。在南部的阿基坦占领区,虽凭借葡萄酒贸易的盈余,能实现数百人远征队的收支平衡,却无力发起实质攻势,只能被动防御。而原来支持英王的法国贵族,也开始在英法间摇摆,既不承担实战风险也不提供可靠援助,这令英王的外交政策屡屡落空。加之本国议会对新税抵制加剧,民间与贵族对“英法双王”的认同感急剧衰减。^③亨利六世名义上的“双王”身份在财政、军事与政治的多重压力下逐渐失效,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

可见,《特鲁瓦条约》虽然赋予英王拥有法国王权,也曾短暂实现“二元君主制”的构想,但这一体制难以支撑,无法阻止查理七世恢复王权统治,而英国在法国的领地也由此彻底失去。

二、法国贵族势力对“二元君主制”的影响

这场战争并非两个国家或两个国王之间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无论是英国的贵族还是法国的贵族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法国贵族众多,不能一一论述,其中最重要的贵族是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公爵在法国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勃艮第公国的利益,他最初与英王亨利五世结成联盟,力图扳倒查理七世。^④但随着英国危及到勃艮第公国及其他法国贵族利益后,他们又纷纷转向查理七世。这种转变并非传统观点中由于圣女贞德的出现激发法国民族意识推动,而是以地方利益为导向。勃艮第公国这一时期(1422—1435)的利益取舍与政治转向在法国贵族势力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立场转变直接影响到英王对法国“二元君主制”的合法性。

(一) 勃艮第公国的立场转变

勃艮第家族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迅速崛起,并通过婚姻、继承与兼并等方式拥有了弗兰德斯、阿图瓦、那慕尔与勃艮第本土等领地,形成覆盖法国东北部与尼德兰地区的庞大复合型公国。查理六世是年幼时继承王位且患有精神疾病,需要重臣辅政,因而以勃艮第公爵无畏约翰(Jean sans Peur)为首的“勃艮第派”与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Louis Ier de Valois)为首的“奥尔良派”围绕着摄政权展开了争夺。由于两派

①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p. 193.

②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p. 179.

③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pp. 179-189.

④多数历史学家指出,所谓的“英勃联盟”并非基于国家利益,而是建立在个人政治动机、短期策略和偶发事件之上的非正式个人合作关系。正如Christine Carpenter所强调的,这一联盟是“态度而非体制”,更多体现的是个别王公如亨利五世、贝德福德公爵以及善良菲利普的权宜之计,而非英国和勃艮第之间的国家结盟。Richard Vaughan和Wim Blockmans等学者都指出,勃艮第在联盟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主,其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自身在低地国家和法国内部的利益。善良菲利普的对外政策并非出于对英国的忠诚,而是将英国作为其更大地缘战略的一部分工具。一旦英国的政策触及其利益底线,勃艮第便转向与法方谈和。

争权夺利，加之长年战争，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提升。1407年无畏约翰策划刺杀了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引发了法国内部贵族间的混战。但刺杀丑闻也使勃艮第派政治失利，新任的奥尔良公爵瓦鲁瓦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成为摄政王。无畏约翰不甘心失去权势，转而选择支持英王亨利五世，也就是1415年查理六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后，趁机占领了巴黎。这种法国地方贵族势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与英国合作的做法，使英法战争局势胜败立现。

在双方的联合下，查理六世（因精神错乱，由王太子查理主政）的军队节节败退。法王为了缓和法国国内的政治分裂，而无畏约翰为确保勃艮第公国及其在低地国家的统治地位，双方商定在蒙特罗桥进行和谈。然而，遇刺事件打破了和谈梦想，却直接促成了勃艮第与英国的联盟。^①无论是出于仇恨还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衡量，^②继承了勃艮第公国的善良菲利普（Philippe le Bon）将此前秘密缔结的协定转变为公开的联盟。

勃艮第公爵善良菲利普与英国的结盟并非单纯的复仇心理，而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此前历代勃艮第公爵的统治重心主要集中在法国东部的“勃艮第领地”（Duchy of Burgundy）和法兰西境内的附属领地。但善良菲利普继位后，统治重心已转向低地国家，从其停留在巴黎的时间，以及查理六世死后仍未亲赴巴黎，可见其统治重心已经转变。对于善良菲利普而言，如何巩固低地领地的稳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与教会的支持，才是其战略重点。此时，与英王亨利五世结盟不仅可以削弱王太子查理的势力，同时也符合法国贵族在内斗中拉拢英国干涉法国事务的传统。例如1297年名义上服从法国的佛兰德伯国（Comté de Flandre）在英法战争中选择了与英国结盟对抗法王，但这时的民族国家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不能以近现代的眼光将其视为叛国行为，这在当时只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同样，与英国联盟也为菲利普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在军事层面，联盟使王太子查理的军队陷入被动，这使得菲利普在法国内部政治地位更加稳固；在舆论层面，菲利普借蒙特罗桥案发动了一场舆论宣传战，将王太子查理描绘成刺杀案的凶手，抨击其恶行以削弱其在法国国内及国际上的合法性。菲利普甚至委托勃艮第法学家起草控诉状，要求王太子公开忏悔并接受象征性惩罚。

如前所述，法国地方贵族势力与英国的这种联盟并非基于共同政治理念，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菲利普为实现自身复仇目的以及维护自己公国领地安全所采取的阶段性策略。菲利普并非完全依赖英国，他同时与波旁、洛林和萨伏伊等邻近势力缔结合作条约，并通过与布列塔尼公爵联姻实现其战略。^③1422年为了巩固与法国王室的血缘纽带，争取法国内部支持，他选择与法兰西公主米歇尔结婚，但米歇尔早逝，未能实现其政治目标。随后，为了通过摄政身份强化在低地的统治权威，1424年他又与阿图瓦的邦娜（Bonne of Artois）结为夫妇。但邦娜于1425年早逝，这使得菲利普认识到与法国王室联姻难以为其提供持续的政治依靠。^④最终，他通过与葡萄牙的联姻，既摆脱了对英法的单向依赖，又宣示“勃艮第既非法王附庸，亦非英王盟友”的新定位。

联盟的脆弱性很快表现出来，毕竟这种建立在复仇心理与权宜之计的联合缺乏稳定的共同利益基础。很快勃艮第与英国之间因低地国家的继承权纷争而出现严重裂痕，1420年布拉班特公爵约翰四世（Jean IV de Brabant）^⑤的妻子雅克琳（Jacqueline de Bavière）因政治与婚姻危机逃往英国，并与英国格洛斯特

^①Georges Chastellain, Oeuvres, ed. Kervyn de Lettenhove, 8 vols. (Brussels, 1863-1866). 编年史家乔治·查斯特兰对善良菲利普得知无畏约翰死讯后的表现做了描述：“年仅二十三岁的菲利普痛哭流涕地瘫倒在床，咬牙切齿、翻白眼。”

^②参见 Georges Doutrepoint, La Littérature à la Cour de Bourgogne, (Paris, Bibliothèque du XVe siècle, 1909). 此事在议会中进行了讨论，家族内部也展开了商议。

^③Wim Blockmans and Walter Prevenier, *The Promised Lands: The Low Countries Under Burgundian Rule, 1369-153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 p. 62.

^④Blockmans and Prevenier, *The Promised Lands*, p. 52.

^⑤布拉班特公国（Duchy of Brabant）位于今比利时中部，今天的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卢汶等重要城市都在其辖境，是低地国家中最富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国之一。

公爵再婚，试图借助英国力量争夺海诺和荷兰的控制权。这一举动严重威胁到菲利普对低地国家的统治，^①引发了双方的军事冲突，导致联盟关系出现裂痕。此后菲利普一方面继续维持与英方形式上的联盟，一方面主张自己的独立性，其统治也越来越像一位“准君主”。

最终在 1435 年双方关系迅速恶化，菲利普转而与查理七世和解。9 月 20 日，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与查理七世在阿拉斯签订条约，双方和解。菲利普终结了与英国的军事同盟，正式承认查理七世为法国国王，并将巴黎交还给查理七世；查理七世则允诺勃艮第公爵保有其领地并免行臣服之礼，还将皮卡第割让给勃艮第公国。《阿拉斯条约》对法国扭转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豁免菲利普对其行封臣之礼，寓意着承认“勃艮第既非法王附庸”的新定位。

菲利普追求的是“勃艮第既非法王附庸，亦非英王盟友”，想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他并非单纯效忠于英王或法王，而是依据自身利益需要确定合作目标：在法国，无论联英还是联法，都是为了巩固对法国的影响力；在低地地区，始终维护并加强自身的控制力。菲利普不再满足于封建领地“各省并列”的状态，而是希望通过对行政、财政和司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具备共同行政机构、共同财政、共同法律与共同市场的“复合君主国”。^② 尽管勃艮第公爵们实际上并未创建一个现代国家，但这也真实反映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封建贵族势力为了维护自己地方统治和获取地方利益，积极调整政治外交策略，力图尝试摆脱传统王权束缚。这也寓示着中世纪封建结构开始逐渐向近代国家制度过渡的历史趋势。^③

（二）法国其他贵族势力的政治认同

早在加佩王朝初期，法国各地公国等地方贵族就拥有相当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控制着地方政权。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期，这些公爵、伯爵对王权和地方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他们的利益所系直接关系到其政治认同，这对于理解二元君主制能否在法国持续下去非常重要。

法国贵族不仅是这场王位继承权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其政治选择更是确定王位合法性的关键力量。许多贵族在两国王权之间左右摇摆，他们的择取意向与现代意义上民族认同或国家观念无关，在现代民族意识尚未形成前，贵族们更多基于对自身地方利益的权衡。诺曼底便是典型案例，当地贵族在英军占领时期普遍展现出相对合作的态度，并未大规模抵抗，接受了英国统治下所恢复的公国传统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唤起了地区性认同，也使英方能以合法形式治理地方，增加统治的正当性。诺曼底三级会议向英方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正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充分体现。^④ 英国方面也有意维持这种“合作”，通过承认诺曼贵族的司法特权、土地继承权与传统头衔，换取对英王的支持。这种利益互换式的忠诚构成了英王在法国占领区维持统治的关键基础，诺曼底地区的地方主义特征也因此表现得尤为突出。

战争后期，法国这种地方主义特征仍在持续。如在法国军队收复加斯科尼（Gasconne）驱逐英国势力后，法王对西南部的统治并不稳定，1452 至 1453 年间，当地爆发大规模反抗查理七世的叛乱，地方贵族借此表达对中央王权的不满。这场叛乱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地方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叛乱爆发前，法国内部许多贵族已与英国保持长期密切联系，并在精神上认同英王统治。例如，福瓦家族成员在 1440 年后期通过与英国王室联姻，借此强化他们在加斯科尼的地位。^⑤ 这类事件表明，在百年战争之后，地方贵族对法国王位继承的法理性仍保持各自的立场，并希望借助外部势力维护地方利益与特权，这也成

^①Richard Vaughan and Graeme Small, *Philip the Good: The Apogee of Burgundy* (History of Valois Burgundy), Marlesham, Suffolk: Boydell Press, 2004, p. 40.

^②Robert Stein and Graeme Small, *Magnanimous Dukes and Rising State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380-14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55.

^③Robert Stein and Graeme Small, *Magnanimous Dukes and Rising States*, pp. 255-257.

^④Warner, "The Anglo-French Dual Monarchy," p. 119.

^⑤Andrew D. M. Green, "Regional Networks in Revolt: Opposition to the Valois in Gascony at the End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c. 1452-1453," *French History*, advance article published February 20, 2025, <https://doi.org/10.1093/fh/craf004>, pp. 3-5.

为法国恢复传统王权血统过程中的强大阻力。

简言之，在百年战争中，法国地方贵族的政治认同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他们以己身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结盟于英国，支持英王的法国王位继承权，使二元君主制在某一时期具有合法性并得以实施。另一方面，这种以地方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使得法国贵族政治立场左右摇摆，其结果是：英王对法国的统治没有形成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阻碍了法国政权统一的进程。

三、查理七世时期王权正统性的重建

（一）圣女贞德对法国王权正统性的重塑

英王控制最为强盛之际，也就是法国王太子查理处境最为艰难之时，而圣女贞德的出现成为关键转折。1429年贞德率军解除了奥尔良之围，彻底扭转了英法百年战争，由此战局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贞德又于7月16日解放了兰斯，这是法国历代君主受洗圣地。在贞德的护佑下，7月17日，查理在兰斯大教堂（Reims Cathedral）被涂圣油，正式加冕为法国国王。^① 兰斯涂油加冕仪式，不仅从宗教上赋予了查理神圣性，也在政治上重申了法国王位继承不可替代的合法性。1430年贞德被勃艮第人俘虏，并被出卖给英国人，1431年被英国主教判处火刑，于5月30日处死。贞德殉难而死，反而激发了法国民众的情感。圣女殉难，其宗教象征与胜利精神进一步凝聚了民众对查理的支持与对英王的抵制。

圣女贞德为法国民众创造了一种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为法国民众提供的是与英方话语截然对立的认同象征。因此，圣女贞德不仅仅是一名军事领袖，更是查理七世获得法国王权合法性的重要精神力量。她将军事胜利与宗教使命相结合，使法国民众在情感与精神层面认同查理七世的君权。这种以宗教象征与情感为基础的认同，成为法国重建王权正统性的核心支撑，也为后续法国中央集权的发展奠定了舆论与情感的基础。

（二）查理七世重建自身王权正统性

针对亨利六世的舆论宣传，查理七世除了反复引用《撒利克法典》，强调法国王位只能由男性、通过父系世袭继承的原则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如1429年于兰斯加冕、1431年后塑造圣女贞德形象等方式实现了军事胜利与王权重建。1435年9月，又通过《阿拉斯条约》（Treaty of Arras）实现重大外交胜利，瓦解了英国与勃艮第公国的军事联盟，成功修复了与勃艮第公爵善良菲利普的关系，不仅使亨利六世在法国占领区的统治更加困难，也强化了自身在法国的王权权威。1440年，查理平定了贵族联合发动的“布拉格叛乱”，有效压制了地方贵族势力，进一步增强了王权，这些行动使法国王权逐渐摆脱对地方贵族的依赖，奠定了中央对地方军事与政治的掌控。

战争后期，法国炮兵的战术运用扮演了关键角色。炮手指挥官让（Jean）与加斯帕德（Gaspard）在战场上广泛部署火炮，形成类似英军早期倚赖长弓手所带来的战术优势，有效改变了战局走向。^② 此种技术与战术的转型不仅推动了法国从英军手中收复诺曼底、阿基坦，更加速了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统治的最终瓦解。查理于1449年正式出兵诺曼底，次年即攻占重镇鲁昂。随着鲁昂等地相继被收复，法国王权不仅得到了增强，还通过战争中军事和财力的扩张，进一步增强了对全国的实际控制。

1453年，随着卡斯蒂永战役（Battle of Castillon）中英军的惨败，英国在法国最后的据点——加斯科尼地区彻底失守，英国在法国本土除加莱外的所有领地全部丧失。这场战役的结束不仅代表着百年战争的结束，也代表着英国“二元君主制”的完全破灭。亨利六世本人因这场失败加之患有精神疾病，使他在民众和贵族心目中声望尽失。后来英国内部爆发红白玫瑰战争，长达数十年的血腥内战与权力更迭，使英国无暇东顾法国领地的得失，自此彻底成为岛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在百年战争后，王权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近代早期法国的国家整

^① 德博拉·A. 弗雷奥利（Deborah A. Fraioli），《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第133页。

^② 德博拉·A. 弗雷奥利（Deborah A. Fraioli），《圣女贞德与百年战争》，第99页。

合和君主专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查理七世依靠宗教象征、军事胜利与制度改革，不仅重建了王权的正统性，还间接削弱了贵族势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随着百年战争的结束，法国逐步形成对王权的共同认同，这种认同在后来瓦卢瓦王朝与波旁王朝的统治中被进一步扩大，成为法国走向中央集权与近代国家整合的关键基石。

英法“二元君主制”不仅是一次跨国王权整合的尝试，也是促使中世纪晚期王权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要素。英国摄政政府并未完全依赖《特鲁瓦条约》所提供的法理支撑，还通过舆论宣传、视觉象征等方式在法兰西北部 and 英国本土塑造亨利六世双王的合法形象。尤其是，英王亨利六世对其主要对手法王查理七世形象的负面宣传，作为其合法性斗争的重要方式，反映出在王权基础不稳时，统治者如何借助舆论宣传等手段强化政权认同。由此可见，中世纪晚期王权合法性并非仅依赖于血统与法律，而是在战争与社会动员中被不断重构。从长时段视角看，英法在百年战争之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英国在战败后失去法国领地从而专注国内事务，在这一过程中，议会在约束王权与权力平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进程无意中为英国议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法国在查理七世的军事胜利、圣女贞德的象征、兰斯加冕的神圣仪式及改革等多重因素效应下，王权认同逐步恢复，地方主义不断削弱，为近代早期法国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法百年战争因“二元君主制”而起，战争使两国的政治轨道明显分化：英国在此战争进程中逐渐走向议会政治，而法国则在战后走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 Monarchy” in France after the Treaty of Troyes

WANG Yu-liang, HAO Wen-zhuo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England and France engaged in an intense struggle over the French royal success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kingship. The English, relying on the Treaty of Troyes, asserted their regency and succession rights in France and sought to delegitimize Charles VII by portraying him as a “false king” through linguistic control,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ublic propaganda. In response, the French side countered with the symbolic image of Joan of Arc and the traditional coronation ceremony at Reims. Meanwhile, regional noble powers frequently shifted their political allegian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further complicating the situation. With successive military victories and strategic propaganda, Charles VII was ultimately able to re-establish the legitimacy of his rule. This conflict over succession and legitimacy illustrates that royal authori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was no longer grounded solely in bloodline or legal claims, but was continually reshaped through warfare and societal mobilization.

Keywords: Traité de Troyes; Anglo-French Dual Monarchy; royal legitimacy; Joan of Arc

[责任编辑 山阳]